

刘氏奉朝请在天监之初，故以他于天监三年兼任肖宏记室的可能性最大。勰之兼任或一年许，天监四年便转迁“车骑仓曹参军”，其接任者看来就是鄒泛。以笔者之见，勰、泛、迟、昭四人于天监三年正月至六年四月间，相次任职宏府，任期最长者不过一年许。这于正史本明白可案，而刘勰独专中军记室数年之说，殊为不实。且六年闰十月至八年四月，本孔休源任职宏府记室（参见《梁书·孔休源传》），故杨先生据道宣之记断定“天监七年十一月之前，舍人仍任职肖宏府中”，亦非合理。

此外，依笔者浅证，勰之迁车骑仓曹参军，亦不如杨先生修订所言在“天监八年四月撰经功毕之后”，而在天监四年间。“车骑”是“车骑将军”之省称（杨先生58年误注为度之尚书所统仓部，修订时删去该注，但又未注明车骑之义），乃南朝最高军阶之一，其督府亦有列曹参军。仓曹亦十八曹之一，正参军（见《宋志》、《齐志》、《隋志》）。据《梁书》之《武帝纪》和《夏侯详传》，天监三年至六年，车骑将军乃夏侯详。刘勰之为夏侯详府仓曹参军，亦当在四年至六年间。六年十二月，夏侯详病死。由于梁朝冗官冗员多如牛毛，刘勰作为车骑督府中的旧员、约一年许不得安置，本是情理中事。到七年十月肖衍敕僧旻续集《众经要抄》，以勰“长于佛理”，且无具体职务，故选豫其役。“证功毕”，出为太末令，这就是天监四年至八年期间刘勰的政历，也是他参与备钞众经的原因。又因夏侯详死，而勰尝任职宏府，故《续高僧传》有“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之称。显然，这是不足以判断刘勰担任肖宏府记室的时间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于成都

关于普希金作品的最早中译本《俄国情史》

林德海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六月由上海大宣书局发行的《俄国情史》（发行所为上海开明书店和文明书店），是著名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该书中译为普希罄）的作品的最早中译本，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最早中译本。《俄国情史》究竟是普希金的哪一部作品呢？这个问题长时间得不

到解决。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戈宝权和管珑两同志看到了这本书，才知道是中篇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的中译本。《俄国情史》系该书的封面书名，卷首所题书名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为什么要将《上尉的女儿》译成这样的书名呢？黄和南在为该书写的《绪言》中告诉我们：“其曰情史者，乃袭用原译者之原用名词也。”译者为清末留学日本的戡翼翬。他所依据的不是俄文原本，而是日文译本。在该书卷首书名下端，题有“日本高须治助译述，房州戡翼翬重述”。

按日人高须治助所译的《上尉的女儿》的日译本，是在明治十六年（公元1883年）六月出版的，书名题为《露国奇闻 花心蝶思录》，三年后再版时改名为《露国情史スミス・マリ/之伝》（即《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中译本的书名即采用日译本两个版本的题名。但是，日译本乃译自俄文原本，今尚无定论。戈宝权同志即持日译本《俄国情史》系据英译本转译之说，管珑同志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苏联与日本的一些学人亦曾认为高须氏的日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

但是，我们只要进一步考查一下日译者的身世，对此说将得出否定的结论。原来，日译者高须治助（1859—1909）是一个精通俄文的翻译家，曾就读于当时的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明治十三年（1880）休学后任职于大藏省翻译课，是日本最早一部俄日辞典《露和袖珍字汇》（明治二十九年丸善版）的编纂者（在这之前还编过《俄日会话》），晚年曾在俄国战俘收容所任职和充任俄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日语教师。而《上尉的女儿》的日译本是在他从东京外国语学校休学之后问世的。人们不禁会问高须治助为何不直接通过俄文来翻译普希金的作品，而偏要根据英译本转译呢？其实，日本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柳田泉氏早在五十年代初在其所著《明治初期翻译文学的研究》（1951）一书里，通过对高须治助的生平和当时的《内务省版权书目》的研究，就已作出了日译源自俄文的结论。他并且指出，书中男女主人公名字的英国化译法，乃是一位姓服部的书报检查官干预的结果。

戡译《俄国情史》是用文言文翻译的，且有删节。最早直接从俄文译出的《上尉的女儿》的白话文中译本，是在《俄国情史》问世十八年之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1年2月出版的安寿颐译《甲必丹之女》。耿济之和郑振铎为该译本写了序。